

# 小国大外交 ——东盟外交策略及启示研究

李优坤◎著

XIAOGUO DAWAIJIAO  
——DONGMENG WAIJIAO  
CELVE JI QISHI YANJIU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小国大外交 : 东盟外交策略及启示研究 / 李优坤著

— 广州 :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5.6

ISBN 978-7-5100-9905-2

I . ①小… II . ①李… III . ①东南亚国家联盟—外交—研究 IV . ① D8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0031 号

## 小国大外交——东盟外交策略及启示研究

---

策划编辑: 李 平

责任编辑: 廖才高 王梦洁

封面设计: 彭 琳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电 话: 020-84459702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100-9905-2/D · 0121

定 价: 3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言

东盟成立后，东盟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声誉日隆。这不仅是因为其在经济上的卓越成就，同等重要的是东盟国家以中小国家的现实，实现了超越其能力的外交成就，并自始至终表现出了和实际地位不相称的大国梦想。这正是笔者要探讨东盟国家“大”外交的起因。

从严格意义的大外交而言，东盟这一群小而弱的国家是不应该有大外交的。但也就是这一群弱小的国家，却拥有和其地位不相称的大国梦想，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大国外交。因此，东盟国家是有常人难以想象的大外交的，尽管这个“大”字要加上引号。其中，老东盟的马哈蒂尔、苏哈托和李光耀对“大”外交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东盟组织成立以前，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就有“大”的成分。在冷战环境下，争取独立自主地位，是其中最显著的内容。而东盟的成立是东南亚国家这一努力的最重要结果，也是东南亚国家外交走向理性的重要表现。

1970年代直到冷战结束是老东盟国家“大”外交的发展阶段，而冷战后时期则可以看作“大”外交的成熟期。主要的依据就是老东盟国家的大国平衡外交和大国梦的展示程度。由于冷战后东盟国家对西方的依赖程度更低，更重要的是开展了以东盟为主导的亚太机制化外交，因此，本书把冷战后阶段作为东盟国家“大”外交的成熟期。

以小做大、敢作敢为，特别是以国家最核心的利益为中心等，是老东盟国家“大”外交的最重要特点。而经济上融入西方、军事上依靠西方以及整治上的独立自主等则是老东盟国家“大”外交的内容。而东盟这一区域组织则是东盟国家进行“大”外交须臾不能离开的重要工具。

从外交收益和成本的比较角度来看，老东盟国家的“大”外交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由于始终维持了国家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因此，从总体上是比较成功的“大”外交范例。再说，老东盟国家“大”外交的许多负面效果都是东盟国家自身小而弱的国情决定的。

中国 and 老东盟国家尽管表面看国情迥异，但外交却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有强烈的大国梦，都曾遭受长期的殖民耻辱，都曾面临险恶的国际环境等。当然，中国和老东盟国家毕竟在许多方面还有很多差异。比如，中国是大国，老东盟国家是中小国和弱国，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异端”，而老东盟国家则是资本主义世界长期争取的对象等。

正因为如此，中国从老东盟的大外交中可以汲取诸多的经验教训，为实现中华崛起的中国梦提供诸多的启示。

# 目 录

序 言 .....	01
第一章 老东盟小国的“大”外交及其实质 .....	01
一、外交和大外交 .....	01
二、东盟国家的地缘政治环境 .....	06
1. 重要的地理位置 .....	06
2. 一群弱小国家 .....	08
3. 以多样性著称的“破裂地带” .....	09
4. 冷战的影响 .....	11
三、老东盟国家的外交抉择 .....	13
1. 小国的生存之道 .....	13
2. 老东盟国家的选择 .....	17
四、东盟国家老一代领导人的个性与“大”外交 .....	20
1. 执政时间、地点与东盟国家外交的“大”外交 .....	20
2. 成长经历、个性与东盟国家“大”外交 .....	22
3. 对东盟国家“大”外交的具体贡献 .....	26
第二章 东盟国家“大”外交的萌芽 .....	32
一、国际国内局势与东南亚外交 .....	32
1. 民族主义的兴起 .....	32

2. 殖民时期的历史遗产·····	35
3. 国际环境·····	38
二、对“大”外交的探索·····	41
1. 印尼：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	41
2. 印尼争做“新兴力量代表”外交·····	44
3. 新加坡的“大国平衡外交”·····	47
4. 同盟中的独立自主·····	48
三、东盟的成立·····	51
1. 20 世纪 50 年代东南亚地区的区域合作·····	53
2. 20 世纪 60 年代东盟成立前东南亚的区域合作·····	55
3. 东盟的产生之路：消除矛盾，走向团结·····	57
<b>第三章 东盟国家“大”外交的发展</b> ·····	<b>61</b>
一、区域形势变化及其对外交的影响·····	61
1. 国际局势变化及对东盟国家外交的影响·····	62
2. 国内局势的变迁及其对东盟国家外交的影响·····	65
二、70 和 80 年代东盟的组织建设和外交·····	68
1. 进一步完善东盟组织·····	69
2. 东盟方式和东盟的“模糊战略”·····	71
3. 东盟在加快自身成员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74
4. 东盟在成员国经济外交中的作用·····	76
5. 东盟国家利用东盟这一区域组织进行的政治外交·····	79
三、组织外的“大”外交·····	83
1. 弱化却维护军事同盟·····	83
2. 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和平、自主、中立外交·····	85
3. 大国平衡外交·····	86
4. 泰国和印尼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卓越表现·····	90
5. 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追求较高国际声誉外交·····	91

第四章 东盟国家“大”外交的成熟 .....	93
一、冷战结束后局势与东南亚外交 .....	93
二、东盟组织的完善和外交 .....	101
1. 东盟的扩大和合作的深化 .....	101
2. 构建第二轨道外交 .....	105
3. 组建以自己为主导的亚太多边对话机制 .....	107
4. 拓展经济合作的空间 .....	111
三、东盟国家的“大”外交 .....	113
1. 军事安全领域的大国平衡 .....	113
2. 政治经济领域的大国平衡外交 .....	115
3. 争做第三世界代言人 .....	118
4. 印尼、马来西亚独具特色的伊斯兰外交 .....	123
第五章 东盟“大”外交的内容 .....	127
一、“大”外交的特点 .....	127
1. 体现最核心的国家利益 .....	127
2. 鲜明的独立自主特色 .....	130
3. 善于以小做“大” .....	132
4. 敢作敢为的形象 .....	133
5. 注意借助集体力量 .....	134
6. 外交内容逐渐丰富 .....	136
二、“大”外交的内容 .....	138
1. 经济上融入西方 .....	138
2. 军事安全上依靠西方 .....	141
3. 独立自主与对西方依赖的结合 .....	143
4. 追求较大国际声誉 .....	144
5. 有关“亚洲价值观”的争论 .....	146
三、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 .....	146
1. 促进东南亚的团结稳定 .....	146

2. 大国夹缝中生存的需要·····	148
3. 大国梦赖以实现的重要依托·····	149
4. 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	151
<b>第六章 新中国外交与东盟国家的比较</b> ·····	<b>154</b>
一、新中国外交环境与东盟国家的相似之处·····	154
2. 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的极度复杂·····	158
3. 国际安全和发展环境的长期复杂·····	160
4. 中国和东盟国家都长期是国际竞争的“弱者”·····	164
5. 中国和东盟国家长期都是发展中国家·····	166
二、新中国外交环境与东盟国家的不同之处·····	168
1. 中国国家身份的复杂性·····	168
2.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东盟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	170
<b>第七章 老东盟大外交对中国的启示</b> ·····	<b>173</b>
一、正面启示·····	173
1. 必须坚持外交为内政服务·····	173
2. 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从不意味着隔绝与超级大国的联系·····	178
3. 在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全球化时代，外交斗争必须坚持斗而不破 的原则·····	180
4. 借助集体的力量，是国家声望构建的重要路径·····	181
二、负面启示·····	183
1. 外交必须控制过度民族主义的冲击·····	183
2. 对国际声望的追求，必须和国力相适应，必须量力而行·····	186
三、借鉴老东盟国家外交，推动中国外交更加理性·····	189
<b>参考文献</b> ·····	<b>192</b>



## | 第一章 |

### 老东盟小国的“大”外交及其实质

小国的“大”外交是学术界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那么小国，特别是老东盟（从东盟成立到冷战结束后大规模扩军之前的东盟，这个时期的成员国称为老东盟国家）的小国是否有“大”外交呢？我们先从外交和大外交谈起。

#### 一、外交和大外交

英国著名学者欧内斯特·萨的定义认为：“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制处理独立国家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和附庸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简单地说，是指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而前苏联外长、著名外交家葛罗米柯所著的《外交学》则认为：“外交是各国首脑、政府和专门的涉外机构所进行的正式活动，旨在通过谈判、文书往来和其他手段来完成由统治阶级利益所决定的国家对外政策方面的目标和任务，以及捍卫该国在国外的权利和利益。”<sup>[1]</sup>

牛津《英语词典》认为外交是“通过谈判处理国际关系，由大使和使节调整和处理这些关系的方法；外交官的业务和艺术”。而美国的《韦伯斯特斯英语词典》则把外交定义为：“由国家首脑直接或委派代表处理国家间关系，驾

[1] 关于外交的定义参见黄金祺：《外交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驭国际谈判的艺术；从事这种谈判的技巧。”《辞海》给外交下的定义是：“国家为实行对外政策，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外交代表机构等进行的诸如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交文件、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外交是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辞源》的定义为：“今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交涉为外交。”而《中国大百科全书》则认为，外交是“国家以和平手段对外行使主权的活动，通常指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外交机关代表国家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sup>[1]</sup>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主编的《世界外交大辞典》，对外交的定义是：“国家以和平方式，通过正式代表国家的行为，在对外事务中行使主权，以处理与他国的关系，参与国际事务，是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行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sup>[2]</sup>

从上可以看出：首先，外交是主权国家的行为，由国家外交代表机构或者经由国家授权的代表进行。国家主权对内意味着最高统治权，对外意味着能够独立从事和其他国家交往的权力。因此，外交只能是国家主权的一个属性，国家的对外交往，必须由能够代表国家的机关进行。一般来说，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都是当然的正式代表，国家专门委派，并经正式授权的代表，如大使、特使、常驻联合国代表等，则往往在某一国家或国际组织内代表自己国家，和他国或国际组织进行官方往来。这些机构，自然可以代表国家，进行的各种交往活动也自然属于外交的范畴。而其他一些非外交系统的政府官员，也可经授权在某一时间和某一事件上代表国家进行外交活动。

其次，外交应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国家利益是外交最核心的概念，通过对外政策，达至国家利益的最好实现是外交的最重要原则。摩根索说过：“所有当代成功的政治家都把国家利益作为他们政策的最高标准，在国际事务中，没有一个伟大的道德家达到过他们的目标。”<sup>[3]</sup>正因为如此，评价外交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国家利益的实现程度。周总理所说：“外交干部是不穿军装的解放

[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6页。

[2] 黄金祺：《论“外交”新定义的理论特色》，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3期，第101页。

[3] 汉斯·摩根索：《国家利益的捍卫》（Hans Morgenthau, in *Defense of the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1），第34页。

军。”也是说外交和军队一样，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

其三，外交以国家综合国力为基础。“弱国无外交”这句话明确表示出综合国力和外交之间的关系。摩根索早就提出了外交政策受到国家权力因素限制的观点，后来为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者所津津乐道，并成为现实主义范式的主要理论基础。<sup>[1]</sup> 新中国建立以前被世界列强瓜分的历史自不必说，就是冷战后，世界政治日益走向机制化的今天，在某种程度上，外交的实质仍然是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讨价还价活动。

其四，外交的代表性手段是和平手段，和平谈判、磋商、对话及参加国际会议是外交的主要方式。国家之间进行的军队友好往来，被称为军事外交，也属于外交的范畴，却与战争不同。因为军事外交同样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两国或多国往来。我国政府今天在对待国际纠纷时强调“用对话代替对抗”、“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以及“争取政治解决”等，也都是强调外交途径在今天国际社会解决纠纷中的作用。

“大外交”这个词近年来在中外学术著作和期刊文章中不断见到，但是对于这个名词的解释却非常少。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相关著作中看到这个词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进行大外交的主体应该是大国。冷战结束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大作《大外交》，虽然英文名字是“Diplomacy”，但由于其主体都是大国，而且都是具有卓越外交成就的国家，因此被译作“大外交”是恰当的，后来被我国学者广泛使用。

在基辛格的《大外交》里，进行大外交的都是在某一时代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国家。不管是欧洲协调时期的英国、奥匈帝国和俄国、普鲁士，还是冷战时期的苏联和美国等，都是当时纵横于国际舞台，并对国际局势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国。其中的主要人物，如梅特涅、俾斯麦等也都是因为在这些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国家，有卓越的外交成就，才被称为进行了“大外交”的。在美国另一位大师级人物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里，尽管我们很少见到“大外交”

[1] 参见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和和平的斗争》，（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A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Publisher, 1978）的有关内容。

这个词。但很明显，它的“地缘战略棋手”称谓，以美国作为战略参照系，实际上仍然是在说有资格进行“大外交”的大国，因为，“所有的地缘战略棋手往往都是重要和强大的国家”。<sup>[1]</sup>

在当今世界，真正能够进行“大外交”的，也是那些布热津斯基所称的“地缘战略棋手”，也就是具有一定综合国力的大国，这几乎是所有国际关系学者的共识。尽管各位学者对综合国力的计算方法可能有所不同，但具有较多的人口、较大的领土面积、较大的经济规模和较强的科技能力等都是成为“大国”所必备的“硬件”，而民族凝聚力、文化影响力、政府控制力等则是构成大国的必要“软件”。汉斯·摩根索的“国家力量9大方面因素说”、名噪一时的“克莱因综合国力公式”等，都反映出这些方面在综合国力较量中的重要影响。<sup>[2]</sup>

其次，必须要有独立自主进行“大外交”的雄心。只有大国才提出雄心勃勃的“大外交”计划，来鼓舞自己的国民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争取有利地位。如美国冷战后多次提到其外交战略的目标是保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并在世界推广美国式民主、价值和市场观念。中国领导人也多次强调作为发展中大国，要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世界发展，以及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等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印度也无时无刻不在表现自己做一个“有声有色大国”的梦想。俄罗斯则无时无刻不在梦想恢复“往日苏联的光荣”。

但也不是任何大国都有独立自主进行“大外交”的雄心。如二战以后的英国和日本，由于和美国的“特殊关系”，并在外交上一直追随美国，尽管日本在90年代也曾经有过争取“政治大国”的举动，英国还一直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但始终被人怀疑其是否有独立的外交。也正因为如此，这两个国家尽管也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却没有被布热津斯基列为“地缘战略棋手”，主要是没有进行“大外交”的意愿。

[1]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杨成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2] 参见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争取权力和和平的斗争》（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A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Publisher, 1978）和科林·瑞：《世界权力评估》（Ray S. Cline, *World Power Assessment*, Colombia: Westview Press, 1977）的有关内容。

不过，“大外交”的梦想必须符合实际，否则就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一战和二战期间的德国和日本，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日本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有统治世界的迷梦，固然够“大”，但却给两国带来了灭顶之灾。即使今天，不切实际的外交目标，对国家利益的损害也不容忽视。如西方学者所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不计成本地维护自己在道德上的优越地位，以及对第三世界共产主义游击队的极力支援，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声誉，也对国家现代化造成了极大损害。<sup>[1]</sup> 印尼苏加诺时期不顾国内经济状况，进行争做“新兴力量领导”的运动实际上也是得不偿失的。

第三，要有被后人称道的“外交成就”，是构成“大外交”的必备条件。在基辛格的《大外交》中，能被称为成功“大外交”的国家及其领袖为数不多。梅特涅虽然在政治上极其反动，但其维护奥匈帝国利益的均势外交却足以令人称道。维也纳会议通过均势和正统两个原则，维护了欧洲大陆国家之间力量的平衡，也维护了奥匈这个没落帝国的大国地位。其中，梅特涅“说服大国自异中求同”的高超手法，至今仍被人们所称道。而19世纪后半期俾斯麦纵横捭阖的联盟体系和他的“铁血政策”一样，为德国的统一和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是成功“大外交”的一个杰出范例。如西方学者所说，他所实行的谨慎的外交政策，他所建构的绝妙联盟体系，使得大陆上的任何国家不管想做什么，都必须遵循和平解决的方法，都不会损害德国的根本利益。<sup>[2]</sup> 假使不是威廉二世后来改变了俾斯麦的外交策略，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将不可想象。因此，他们的外交被称为“大外交”也当之无愧。二战以后，基辛格和尼克松政府在美国实力衰落情况下和中国缓和关系，以应对苏联全球扩张的均势外交，比较成功地维护了美国在全球的霸权，也是比较成功的“大外交”范例。

综上所述，尽管没有一个确切的大外交定义，但我认为所谓大外交，实际上就是由在一定时期，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大国进行的，并且确实

[1] 参见布恩·理查德：《超越毛：邓小平时代的政治》（Baum Richard,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的有关内容。

[2] 拖布约恩·克努森：《国际关系理论史》（Torbjørn L. Knudsen,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第189页。

为自己国家带来重大战略利益，并在世界舞台上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外交宏图。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多次提到大国的“大战略”，甚至是“大外交”，也主要是针对“大国”的宏图伟业而言的。但有些中国学者，特别是硕博士论文，也喜欢在“小国”的外交前面加上“大”字。<sup>[1]</sup>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外交，主要是想强调小国通过高超的外交技巧，实现了超越其能力的外交成就。本书书名“小国大外交”实际上也表达了上述含义。

## 二、东盟国家的地缘政治环境

### 1. 重要的地理位置

关注环境的国际关系学者往往强调环境因素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其中地理和气候因素尤为受到重视。尽管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减弱地理与气候的影响，但技术永远不可能彻底消除某些地理因素对国家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这些学者认为，一个大国可能因为掌握了具有重要性的地理空间而增加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而一个小国却可能因为占据重要的地理位置而受到大国的重视，也可能因此而成为大国争夺的焦点，成为大国争夺的牺牲品。<sup>[2]</sup>

考察一个区域的地理位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该区域的绝对位置，主要指用经纬度、气候区以及海陆关系等方面来表示的位置，也就是说用自然区来表示出的地理位置；二是看该区域的相对位置，即以其他区域的位置作为参照系显示出的战略位置。从绝对位置来看，东南亚的边界西起缅甸，大致沿北回归线向东直到北太平洋西部的岛屿。在东部，则随着泰国及印度支那的政治界线退缩至北回归线以南，西接印度洋，南邻澳大利亚大陆，东

[1] 如李玉华：《韩国：小国的大外交》，载《当代世界》2005年12期，郑清良所写的优秀硕士论文《小国大外交——新加坡的大国平衡外交》等。

[2] 参见王正毅：《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的有关内容。

至伊里安岛。从自然地理位置而言，东南亚国家处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又处于亚洲和大洋洲之间的连接带，形成两大洲之间的十字路口，是沟通亚洲、非洲、欧洲和大洋洲之间海上交通的要地，也是沟通东亚和西亚以及南北美洲交通的必经之路。

东盟所处的东南亚地区拥有许多有着极为重要战略意义的国际海峡。如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新加坡海峡等都是国际商务和军事上有咽喉性质的重要通道。如果对这些海峡加以限制，有关地区的大部分商业都会受到影响。以从波斯湾到日本之间的油轮为例，如果马六甲海峡受到限制，而必须绕道龙目海峡的话，航程就会增加 950 海里，航期就会增加 3 天。如果往返都要绕道龙目海峡的话，航期就会增加 6 天。从费用上算，绕道龙目海峡需要多行 1900 海里，多花费近 20 万美元，从而导致日本的进口石油业每年将多花费近 3 亿美元。

东南亚几个重要国际海峡之中，介于马来半岛与印尼之间的马六甲海峡，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航行的最短路线，也是东西方海上交通的要冲。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各类船舶约 2000 艘，是同英吉利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并列的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通道。船只的通过量仅次于多佛尔海峡，居世界第二位，在国际战略上就更具重要性。

相对位置及其战略意义实际上是指该国或地区在国际政治和经济竞争中具有的战略重要性。地缘政治学派中的海权论者对于控制海洋的重要性有过精彩的论述。海权论的代表人物马汉认为：“控制海洋，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狭窄航道，对于大国地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sup>[1]</sup> 陆权主义者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区说”则从另一方面对东南亚地区的相对战略意义进行论述。斯拜克曼提出，任何国家只要控制了海洋就将大大限制大陆的潜在力量，并认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区较之所谓的核心地区更为重要。由此斯拜克曼提出了“欲控制欧亚大陆必先控制边缘区”的著名论断。当代地缘政治学家索尔·科恩在其著作《分裂世界的地理和政治》中，对于东南亚在全球地缘战略区和地缘政区的重要性有过这样的描述：

---

[1] 阿里夫德·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7》（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Company, 1897），第 298 页。

“(东南亚)控制着具有战略意义的狭长海域,加上他们独特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对于依赖贸易的海洋地区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同时,由于他们的陆地通道伸向欧亚大陆的重要地区,因此他们的命运同样关系到这一战略区的命运。”<sup>[1]</sup>

东南亚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 2. 一群弱小国家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国家,由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 17508 个大小岛屿组成,其中约 6000 个有人居住。陆地面积为 190 多万平方公里,而且领海面积约是陆地面积的 4 倍。再加上具有国际战略意义的海峡,长达 3.5 万公里海岸线和总数达 2.2 亿的人口规模,印尼的确具有大国至少是地区大国的潜力。但是,印尼国内复杂的民族和宗教矛盾,经过多年快速发展后仍然仅比泰国稍大的经济规模,以及至今仍不能完全稳定的国内局势,实在担当不了大国的重任。时至今日,印尼国内的农业人口仍占全国总人口的 70% 以上,恐怖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仍然威胁着印尼的主权和稳定,经济发展也面临许多难题,就连成为东盟领袖的能力都受到质疑,更别说地区大国,乃至全球大国了。

泰国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民族和宗教矛盾也远没有印尼那么复杂。但是,他们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他们就连成为地区大国的可能性都不大。马来西亚的国土面积只有 33 万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 2 千多万,而且东马和西马还相距 1 千多海里。泰国的国土面积为 51.3 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是 6 千多万,但国内的经济远谈不上成熟。至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新加坡和文莱,则只是两个袖珍国家。狭小的国土空间和很小的人口规模,使他们对于大国的身份只有做梦的份儿。

另外,从总体上说,单个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基础都比较薄弱,国防能力很

---

[1] 杰弗利·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李亦鸣等译,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58 页。



差。就是东南亚军事实力最强大的越南，在和中国的地区冲突中也显示出，即使同大国中军事实力一般的中国相比，越南的军事实力也照样不堪一击。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东南亚国家尽管不一定完全都是弱国，但却基本都是国际舞台上的小国，虽然有个别国家有可能成为中等国家。东南亚的这一群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小国群，在亚太地区大国环伺的情况下，就显得异常脆弱。

### 3. 以多样性著称的“破裂地带”

东南亚地处亚洲和大洋洲、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是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交汇地带，又受到阿拉伯文明的深刻影响，再加上西方数百年的殖民化历史，一直以来就以多样性著称于世。

东南亚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地区之一，称其为“民族的大家园”也不算过分。据粗略统计，这一地区大约有400—500个民族。东南亚主要国家印尼、菲律宾、越南、缅甸都有50个以上的民族，印尼最多，有200个以上的民族，就连小小的老挝都有近70个民族。由于民族众多，东南亚国家的主体民族在国家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一般都不大，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主体民族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刚刚超过一半，而菲律宾和印尼的主体民族人数才仅占全国人口的47%和40%。新加坡的主体民族人数较多，也不过占总人口的2/3左右。在东南亚民族众多、主体民族又不占压倒优势的情况下，民族关系就显得尤其微妙而复杂。

语言也丰富多彩。不但各民族之间的语言存在重大差别，就是同一民族，在不同地区，语言也并不相同。再加上东南亚独特的地理位置，东南亚的语言就更富多样性，仅本土居民就说着25种语言和250多种方言。<sup>[1]</sup>具体到各国国内，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至少有150种语言，泰国和越南也都拥有70种以上的语言，而印尼则拥有创纪录的670种语言。就连新加坡、文莱这样的小国都拥有不少于17种的语言。

东南亚还是世界宗教的大观园，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几乎都可以找到踪

---

[1] 李勇龙：《东南亚的政治地理论文》（Lee Yong Long, Southeast Asia Essays in Political Geography,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2），第123页。